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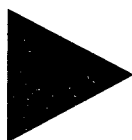
冯天瑜
主编

中 国 知 识 分 子 第 一 人

梁启超

黄敏兰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转 型 间 学 人 评 传 书 系

冯天瑜 主编

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

梁启超

黄敏兰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黄敏兰著.-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转型间学人评传书系/冯天瑜主编)

ISBN 7-5351-2504-2

I. 中… II. 黄… III. 梁启超(1873~1929)-评传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2845 号

出 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电话: 85443735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430015·汉口新华下路 192 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4.25 印张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5 千字 印数: 1—3 000

ISBN 7-5351-2504-2/K·70

定价: 23.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历史的演进,多数时段是在同一社会型范内部运行的,但当各种内外条件细缛积淀,达到某种临界点时,整个社会固有的动力定型便发生突破性变更,正如液态水加温到摄氏 100 度时即转化为气态水一样。纵观人类历史,曾发生过几次大的社会转型,如从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转型(核心内容是采集—渔猎经济向农业—畜牧经济变换),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型(标志是金属工具和文字的使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提升和改造外在世界能力的增强,社会变迁赢得了加速度。如果说,前述两次转型的完成,历时数以千年计,那么,在文明时代,某些社会转型往往经数百年便大体完成。以中国历史而论,周秦之际的两三百年间,曾发生从领主制社会向地主制社会的变迁,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体制乃至观念形态均有大更革,清初哲人王夫之将战国时期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是颇富历史感的概括;此后发生的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更革、唐宋之际的社会更革、明清之际的社会更革,均在百十年间实现。与这些社会更革相互推引,其间学人们展开了风姿卓异的精神创造活动,构成中华文化史上璀璨夺目的篇章。

若就社会变迁的深刻程度而言,可与前述蒙昧时代走向野蛮

时代,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这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相类比的,则是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转型。在长达数千年的文明时代的前期和中期发生的种种社会异动,大体都是在农业—宗法社会内部的局部变迁,而近几个世纪渐次扩及整个世界的现代转型,则是一种全局性的社会质变,其变化的广阔度和深刻度,均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近几个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现代转型,基础性内涵是自然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化,其显著标志是,有机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机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顺应自然”演为“征服自然”,“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巨变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日益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枢纽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则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上述是就现代转型的世界通义而言的。这种现代化的通约性,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明显,而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层面,通约性固然无庸忽略,但民族特殊性也各展丰姿。

三

以世界之大,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颇不平衡。就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论,是以14—16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为其文化标志,学人代表则有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文化巨匠;这一转型的富于力度的展开,则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为启蒙运动,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洛克、哥德是启蒙时代的学人翘楚。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波及全球。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洲四海的人类无论自愿还是被动,均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4世纪,正式展开于18—19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的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内发生型”。对于西欧以外所有其他地区而言,现代化过程虽然各有不同程度的内在动因,却都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与示范之下得以发生,因而其现代化可以称之“外发次生型”。

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转型,又大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文化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欧洲人前来殖民时,当地人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现代文化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那里出现“新英格兰”、“新威尔士”、“新奥尔良”等地名,正是欧洲文明整体移植的表征。另一种类别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文明传统,如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都有数以千年计的文明史,欧洲近代文明来袭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近代”,却不同程度地拥有

与外来的欧洲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汲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全盘欧化”,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化合反应,就当地人而言,既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也要实现文化的民族性因革。这两者间虽包藏着统一的内蕴,却往往在相当长时段呈现相互矛盾、彼此抵牾的外观。而作为这些地区文化重建任务担当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即本丛书所称的“学人”)特别敏锐、深切地感受着并且反映着这种矛盾性。

四

近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是19世纪中叶以降“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世纪末叶方开始出现,20世纪则艰难曲折地成长。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经济上、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一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因为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故而中国中产阶级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充分担当起社会重建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焉,这除了客观条件所使然(如中产阶级未能充分担负分内责任)之外,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渊源与特色大有干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以来延绵两千余年的士大夫。作为现代社会和新的世界背景的产物,身着西服(或中山装或毛式服装)的知识分子在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均与长衫博带的士大夫颇相径庭,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基本摆脱了君统与道统的双重负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基准,其生活路径也大体走出了“学

优登仕”的故辙。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虽脱下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以本丛书涉及到的诸学人为例，大多有直接的士子经历，且不论魏源、冯桂芬辈均有功名，并曾入大吏幕府，或一度执掌州县，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梁启超是前清举人并出入宫廷及大吏门墙，即如鲁迅、陈独秀，也都有“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背景。他们大体都是从士大夫走向知识分子的过渡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保有传统士子心态是情理之中事。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是“士农工商”，与商人自陪末座相对应，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孟子·告子下》），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旨趣，以先觉觉后觉、先知觉后知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但这一目标往往要在依附君权的情形下才能得以实现，由此造成士人“忠君”、“事君”特性；士子又秉承先秦以降的“民本”传统，有着“亲民”、“为民”倾向，故常在“尊君”与“重民”间徘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是他们二重心态的流露。汉代的选举制，尤其是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将士人的治世追求变为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也将士人与君权维系在一起。总之，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19世纪中后叶以降，中国传统社会格局崩解和重组，但从士大夫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虽有日益“边缘化”的趋向，多已走出“忠君”、“事君”故辙，却并未忘却“平治天下”的使命和充当大众精神导师的任务，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西方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一肩挑起的历史因由。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将中国现代学人的双重使命感精要地表述出来。

五

中国近现代社会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会的大转折时期,具有过渡性时代的全部复杂性。这种过渡时代向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提出的使命,不仅有文化的古今转换,还得面对文化上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而中国近现代学人大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多有深厚的家学渊源,青年时代又沐浴欧风美雨,不少人曾留学东西洋,其知识结构兼有“子曰诗云”的中学和涉及声光化电、艺文哲思的西学,成为时代性上的“古今过渡人”和民族性上的“中西边缘人”,其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情感系统呈现多重性,其社会实践(包括学术实践)更异彩纷呈。转型间的中国学人,有的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却又汲取了西学的某些成分(如梁漱溟、熊十力);有的呼唤“全盘西化”或“全盘世界化”,却实则植根本土文化(如胡适);有的早年力倡西学,晚年又回归东方文化(如严复、梁启超)。而这批转型间的学人都有深刻的传统文化情结,即使那些激烈倾向西化的学人,实则理智向着西方,情感却执著于东方。这些都是过渡时代文化二重性的表现。

自19世纪中后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迭兴之际,到20世纪上半叶的数次文化论战,中西体用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常用语,而批评此说的论者也言之滔滔,自成理路。这正是国人为求得文化二重性矛盾解决方案所作的努力。时至20世纪末叶,改革开放大潮涌动,文化讨论再度兴起,中西体用之辨仍然是一大题目,在“中体西用”说之外更出现“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诸说。有人认为这种旧题重说表现了文化讨论的缺乏新意,我却以为这一回环现象正显示着文化二重性矛盾继续困扰着当下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此无可规避。仅仅在这一意义上,回顾并总结本丛书诸传主的心路历程和思维教训,也是大有益处的。

六

转型间中国现代学人各有专业领域,其中一些人在其学术天地足以同古哲媲美,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堪称富于创识的文化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化重建方面的贡献,令人景仰。本丛书传主中王国维之于史学与文学、鲁迅之于文学、胡适之于学术多种门类的建树,均可谓丰碑。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学人作为士大夫传人和现代时代的精神导师,又身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不少人还保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性。有些人(如王国维)虽远离政治,却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托命者自况,怀抱高远,绝无降格为技艺之士的意向。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客观环境的挤兑,如内忧外患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以致相当比例的中国学人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是走进书斋、实验室潜心于文化建设,而是以文化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大众启蒙。低吟“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的康有为,虽也有构筑庞大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有欠精当,他的闪光处却在鼓动变法,导演“百日维新”的悲壮剧;康氏弟子谭嗣同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献身菜市口,演出戊戌变法最惨烈的一幕,人们纪念于此,显然远过于对谭氏颇有拼凑感的《仁学》一书的关注。至于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命的邹容、蹈海自尽以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等,其革命鼓动功能大大超迈其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蔡元培的美学论著虽不乏会通中西的努力,但毕竟有欠深刻周详,他的伟绩乃在以民主精神、“兼容并包”气度创办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北京大学。新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即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白话小说文学价值不朽,但他创作此类篇章意在“为社会”、“为人生”,而并无意挤进“纯文学”的殿堂。

总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本丛书传主多处在此阶段),中国学人虽然也致力于文化重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我们今日从事的文化工作必须以他们的先期努力为基础,但本丛书传主们作为那一时代最活跃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往往直接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之中,成为活动家及领袖人物,或者响应革命前驱的“将令”,使自己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成为其工具与武器。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当时常被视作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文化匠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落,然而,他们的默默耕耘,实乃转型间文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价值日渐彰显。本丛书兼收这两类学人,其意在全面反映转型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风貌,并显现其各自的价值。

七

本丛书的各位执笔均是中青年人文学者,对传主有相当研究,而作为新一轮古今中西文化交会的亲历者,他们对转型时代自有新的体验,这正是对前辈学人心路历程能够得以理解并进行诠释的现实基础。

本丛书的总体设计是否略有创意,各篇的具体展开是否精当,在众多的近世学人传记中,本丛书是否有特别的存在意义?对于这些,实在没有把握,尚待读者诸君阅后评判。

1998年4月上旬构思于武汉大学
4月下旬成文于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校舍

目 录

总序/冯天瑜	1
绪论	1
1. 最早的新知识分子	2
2. 首倡全面现代化	3
3. 爱国和救国的典范	6
4. 启蒙的巨大影响	12
5. 文化学术事业的成就	15
6. 高风亮节	17
7. 辉煌的人生	19
一 维新运动的先锋	22
1. 从乡人到国人的转变	22
2. 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	31
3. 大造变革舆论,掀起维新思潮	39
4. 创新世纪的知识分子	53
二 发起思想启蒙运动	62
1. 探索新的救国途径	62
2. 培养“新民”的宏伟目标	74
3. 对落后国民性的猛烈抨击	83
4. 树立学术救国的典范	95
三 寻求合理的民主化道路	109

1. 选择新的立足点	109
2. 探寻合乎国情的国体	124
3. 关于立宪的论战	134
4. 领导国民立宪运动	152
四 对强权政治的妥协与反抗	175
1. 尴尬的选择	175
2. 结束流亡回国	183
3. 三大政治理想的破灭	188
4. 领导护国运动	206
5. 再造共和的英雄无奈强权政治	235
五 从政治向学术过渡	248
1. 引发五四运动	248
2. 考察欧洲社会,取舍中西文明	259
3. 政治与学术兼顾	266
六 新文化事业的奠基人	292
1. 现代新闻事业的先驱	292
2. 献身现代图书馆事业	310
3. 创立现代教育事业	321
七 树学术丰碑	342
1. 确立现代学术的地位	342
2. 建设中国的政治学	346
3. 开创“新史学”	358
4. 建设新语言文学	378
5. 开创宏观学术史研究新局面	397
6. 对其他多项学科的贡献	407
八 尾声	417
附录一 梁启超主要著作目录	425
附录二 参考书目	438

绪 论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之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当我们仔细考察,即可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一个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当时那些叱咤风云、活跃于政治舞台和思想前沿的英雄,几乎全是知识分子。他们催动了两千年来停滞、僵化的社会,把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历史变成蓬勃向上的、充满希望的历史。知识分子积极引进外国新文化,以学术、文化救国。他们在将传统文化改造并转化为现代文化的同时,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限生机。他们像灿烂的群星,照亮了中国的光明前景。

在众多英雄中,有一位极为独特而又杰出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过去长期被人忽视、被人误解的人物,他就是梁启超。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他的经历最为丰富,活动多样而且范围极其广泛。他既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又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成就斐然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历史学家、文学家、报业家(也称报人)、图书和出版事业家、教育家、目录学家、财政学和宪政学专家,甚至还是艺术鉴赏家。他在每项事业中都卓有成就,其中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令人景仰,足以使一个人功成名就,足以奠定一个人的历史地位。

1. 最早的新知识分子

梁启超之所以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首先在于他是最早的新型知识分子。有些学者认为辛亥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最早的新知识分子:“戊戌一代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仅是初通若干新知的传统士大夫”,而“胡适这一代辛亥知识分子”“正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开山元老。”“他们是旧社会的最后一批士大夫,又是新时代的第一批知识者。”^①然而最后的这句话用于康有为和梁启超身上也许更为恰当。他们既是科第中的人,又都是向新知识分子转化的代表。而梁启超比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早和更多地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成为最早的新知识分子。梁启超对新知识的介绍和运用在那个时代是无与伦比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广泛地影响其后的几代知识分子。胡适只是童年受过传统教育,13岁即到上海接受新式教育,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受教育至1917年。胡适一生获得过欧美各国36个博士头衔。他并未参加过科举,算不上士大夫,完全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而且胡适在辛亥革命时正在美国留学,他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五四时期。胡适在许多方面都曾受到梁启超的极大影响。他与梁启超之间,还隔着辛亥一代知识分子。他应属于第三代新型知识分子。

在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中,梁启超影响和造就的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多。有人说他影响了两代知识分子,有人说他影响了三代、四代甚至更多。曹聚仁说:“过去半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②也许梁启超的影响还不止半个世纪,而更加久

①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01、109页。

②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0—351页。

远。新型知识分子是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梁启超通过教育和影响青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他的文章充满爱国激情,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他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梁漱溟、邹容、吴稚、邹韬奋等著名人物。有多少历史、文化名人在他们的传记、回忆录中记述了梁启超对他们的强烈震撼和巨大影响。我们随便翻开他们中任何一位的传记,即可发现这种表述触目皆是,这一现象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史上是少有的。

2. 首倡全面现代化

然而,我们说他是知识分子第一人,并不仅在于他是最早的新型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关于现代化的内容,有各种理论。一般人根据西方的经验,把现代化界定为经济的发展,而且主要指工业化。中国因特殊原因,需要推行全面的现代化。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比其他知识分子有更深的理解。尽管当时他并不明确了解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及理论。他完全是根据对中国国情的认真研究作出自己的选择。

台湾学者黄克武说:“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是第一位主要提倡‘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家,这一取向后来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①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文化的、思想道德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最重视文化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

梁启超的所有成就都是推行全面现代化的结果。作为政治家

^①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1页。

和思想家,他发起和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现代化运动。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政局变换极为迅速。一场运动紧接着一场运动,环环相扣。一个个历史事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梁启超始终活跃于其间,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他参与策划了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公车上书标志着以新型知识分子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登上政治舞台。作为政治变革的戊戌变法虽然暂时失败了,但是它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而维新思想文化运动则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梁启超选择合理的民主化道路,领导和推动了清末的立宪运动和保路运动。他早期的革命宣传和后来的立宪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严复说梁启超实为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胡适的评论更为确切。他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人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①

梁启超不断与专制势力斗争,日日倡民权,反专制。民国初年,他虽一度与袁世凯合作。但当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是他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谴责窃国大盗的罪行,随即与他的学生蔡锷一起,成功地完成了护国倒袁运动,成为当之无愧的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死后,又发生张勋复辟事件。梁启超说段祺瑞举行“马厂誓师”,结束了复辟丑剧,三造共和。他开创和推行“民意外交”,主动以民间代表的身分前往欧洲,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利益积极游说、奔走。是他将巴黎和会签订损害中国利益条约的消息传递到中国,由他的同志在其报刊上向国民披露,由此而引发了声势浩大

^① 胡适:《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第122页。